

## ※ 學林誌傳 ※

# 回憶恩師趙如蘭

林培瑞\*

一九六二年我剛入大學，已經知道自己喜愛語言，無論是外語還是英文。高中必修的外語我選了法語，上了大學想試試中文。小時候在印度住過兩年，學學印地文也不錯，但是哈佛沒開這門課。梵文的課倒有，可是我想和活人聊天。

「千萬別」，「遠東語言系」（那個年代這麼稱呼東亞）的本科生指導老師告訴我：「第一年先選基本學科，打基礎。中文很耗時間，明年再學不遲。」

因此，我到大二的一九六三年秋天才遇到趙如蘭老師。我選了她的「中文 B」課程。雖說是入門課，“B”卻又並非“beginner”（入門）的縮寫（到今天我也沒搞清楚 B 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年前那位指導老師，還真給他說中了一點：中文很耗時間。我把大二的時間分成兩分：一半專念中文，剩下的支應所有其餘的事。

那年的「中文 B」班共有十二人。有幾個以前多少學過中文，但既然不是趙如蘭教的，初學的人也不算吃虧。她拿四聲給我們打頭陣，然後教授她父親趙元任協同發明的國語羅馬字拼音。別人總說，難為你一個老外，四聲倒分得挺清楚。原因如下：國語羅馬字+趙如蘭。這些年來，我教過三十次左右的入門中文課，從來都是採用國語羅馬字+趙如蘭式教學這個公式，因為管用。更重要的是，別的一大堆辦法都不管用。

要說一個來自紐約上州的十九歲男生愛上了一位已婚的四十一歲中國女士，或許有些出人意料，但事情差不多就是這樣。趙老師不像四十一歲的人。在課堂上她滿屋子地跑，鞋底像裝了彈簧似的輕靈，授課的聲音清朗嫵媚得足以成為你學習中文唯一的理由。有同學背後叫她「惡龍夫人」，是他們誤會她了。她並不凶，只是一絲不苟。如果你發的“h”（比如，「喝」的“h”音）喉音不純，她絕不放過，讓

---

\* 林培瑞 (Perry Link)，本所訪問學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你重說。俗語說「愛之深責之切」，有些同學只覺得趙老師督責嚴切，我感受到的全是「愛」。這麼想的不止我一個。「中文 B」班另外一位大二生，剛好和我同一棟宿舍，叫湯姆·謝弗 (Tom Schaefer)。湯姆和我上「中文 B」興味盎然，回宿舍的路上還會奮力運用「中文 B」的有限詞彙，比賽真刀實槍的日常會話。畢業後我們失去聯繫，不知他後來如何？

不止我一個，中國研究領域有很多的教授都是趙老師啟的蒙，這裏只舉三個例子，傅高義 (Ezra Vogel)、魏克曼 (Frederic Wakeman) 和黎安友 (Andrew Nathan)。不再舉例是因為老師的學生實在太多，不勝枚舉，而不點名絕不代表他們在我心目中不如其他的重要。

大三那年，我跟趙老師學二年級中文，課程上各方面成績仍然都不錯，除了默寫方塊字之外。到了大四，我才終於放棄時間表的二分法，因為我主修哲學，想潛心完成有關倫理和知識論的學士論文，無法再花對半的時間念中文。畢業後，哈佛頒給我一個「旅行獎學金」，我可以全世界任意挑選目的地，旅學一年，所以我決定去港臺（1966年美國人去不了中國大陸）。出發前我先到明德大學 (Middlebury College) 上了一個暑期的速成三年級中文，為下一年的奇遇做準備，負責人正是趙老師的朋友劉君若 (Liu Chün-jo)。

幾個星期後，我到了臺灣。劈頭第一波衝擊是，找不出一個像趙如蘭那樣說話的人。我並不是指大多數的人說的是臺灣話，儘管確實如此；我也不是指那些說普通話的少數人「南方口音」很重，比如捲舌音不捲舌——儘管，這也是事實。我指的是，就算寥寥幾個說北方普通話的，也絕無趙老師那清脆宛如銀鈴的音韻，我心目中中文的本來面目。我恨不得趙老師立即大駕親臨，把他們一個個都拾掇了，還我一個耳根清淨，無奈只是異想天開。於是我寫信向她請教：聽到的都是瑕疵累累的中文，我該怎麼辦？她回信說：「就照我教你的那樣別放鬆，牢牢記著。」

一年以後，我回到了哈佛，從哲學系轉到東亞研究所，讀了碩士學位，然後又成為中國歷史的博士生。我在研究所的第二年，趙老師聘我做中文課的助教，由此開啟我四十年中文教學的序幕，平均每隔一年教一次，還參加編寫了兩套中文教科書。當時美越之戰越演越烈，眼看我不免也要從軍打仗，趙老師和同事們設法聘請我做全職的中文助教，我因此獲得免於強制徵兵的「教學延期」資格，留在哈佛，直到我年滿二十六歲，超過服役年齡，才繼續中斷的研究所學習。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二十世紀初上海通俗文學的興起，題獻給趙如蘭老師。

好些人看我對一位元語言教師這麼大張旗鼓的尊崇，稍以為異——有些是同學，還有幾位替我做顧問的研究所教授，可以說是「雖賢者不免」。大家揣測，或許是我的論文得力於趙老師頗多之故。趙老師的確多少指點我一些，但我題獻的原因卻是「中文 B」。「中文 B」是我上過最重要的課。學好入門中文，在我看來，是一切的關鍵。我立志一窺中國文化的堂奧，如果說我略有斬獲，是因為語言過關，而過關的基礎在於「中文 B」。若是我四聲不分，中國人看待我，只怕要見外，更別提文化上「登堂入室」了。而四聲是當年趙老師賜給我的厚禮。三十七年後的今天，我還是這麼認為。

從一九七五年六月底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初，我像跑馬拉松似地，在七個月內一口氣寫完了博士論文。我和普林斯頓請了半年假，中輟教職，在紐約市租了個小公寓，幾乎足不出戶。為數極少的調劑之一，是聽侯寶林的相聲磁帶。剛開始，聽得我有點摸不著頭腦，但還是愛聽，終究琢磨透了一些段子，背下來幾段，甚至在美國「中演會」（中國演唱文藝研究會）的會後聚餐上來過一段兒。那天趙老師也在，看得出來她心花怒放。我幾乎都聽得見她自言自語：「這不是我自誇……！」

幾年後，她的朋友劉君若邀請我到明尼蘇達大學講一講相聲，順帶表演。趙老師也在，還答應和我搭檔捧哏（「捧哏」的英語相近詞為「直男」“the straight man”）。我自然樂意，只因眾所周知，全場其實是捧哏的在駕馭；我扮逗哏的，滿嘴跑火車，專門添亂的角色。我們就這樣同臺了。我記得趙老師只問了我一句話：「讓我當直男？那直男對什麼，歪女？」

這句話一說，你就知道，老師深明反諷之道。一九八九年，我在六四屠殺第二天把方勵之和李淑嫻帶入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那年秋天，趙老師和我重逢。她一見我就說：「哈，我在報上看到你又搗亂



筆者於明尼蘇達大學與趙如蘭老師說相聲

了！」

趙老師一九九二年退休的時候，我帶著十一歲的女兒聖陶去劍橋參加她的退休聚會。聖陶一九八八年在中國住了一年，中文學得不錯，也喜歡相聲，所以我們就為趙老師表演了一段。此外，我們還裝扮成海象和木匠，當眾背誦了一段趙老師父親翻譯的〈海象跟木匠〉。這篇譯文是趙元任先生的經典教科書《國語入門》的第二十二課，每一頁我在大學都學過。趙老師要求我們把課文全背下來，一九六五年這一課我已經背誦如流，一九九二年我仗著底子扎實，不必從頭學起。聖陶和我拿兩根白蠟燭燒軟了拗彎，充作海象的象牙。

我最後一次見到趙老師是二〇一三年三月。緬因州的科爾比大學 (Colby College) 邀我去講課，回程路過劍橋，順道去看望她。聖陶在塔夫茨大學 (Tufts University) 教哲學，陪我一塊去。我剛出了一本書《解析中文：韻律，譬喻，政治》 (*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哈佛大學出版社 2013 年出版)，題獻給趙老師的父親，想送一本給她。

九十歲的她長期記憶還是很好。認出我毫無問題，也明顯地很高興我去看她。但是她的近期記憶就差了點。她問我：「現在教什麼課？」我告訴她，除了中國文學，以及一堂以跨文化觀點剖析人權的課程，還自告奮勇外加一門鍛煉新生英文的寫作課。我解釋完後，她甜甜地笑了，然後我們把話題又轉到她的父親和我的書。五分鐘過後，她又轉向我問：「現在都教什麼課啊？」聖陶和我道別之前，同樣的問題她又問了兩遍，顯然並不記得已經問過。在這方面，老師是不如從前了。

沒有衰退的是：她每問一句話，她的聲音，儘管有些沙啞，仍然溫暖真誠，一九六三年我為之傾倒，奕奕靈動的神采，餘光依舊熠熠。